

近代中国体育生成发展的历史叙事

程卫波¹, 张志勇²

(1. 山东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2. 山东体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2)

摘要: 研究从“天下”、“国家”、“社会”的角度, 对近代中国体育的生成发展复杂历史进行解读, 借助于对丰富史料的梳理与研究可以发现, “天下”蕴涵着我们对生存体验世界的伦理想象, 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并影响清朝末年新国民体育的孕育与发生, 包含着近代中国体育所蕴涵的特有的强国富民的政治想象。“国家”代表了我国国民在危机与困境中民族意识的觉醒, 这赋予体育崛起与发展的“国家化”色彩, 并通过军国民体育的思想与实践得到充分体现。“社会”意味着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体育向民间的转移, 政治色彩的淡化与日常生活的关注成为这一时期体育发展的主题, 昭示着体育之为体育应有的价值回归。

关键词: 体育史; 新国民体育; 军国民体育; 体育国家化; 体育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 G81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6)05-0069-05

A historical narration of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sports

CHENG Wei-bo¹, ZHANG Zhi-yong²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2. Shandong Sport University, Jinan 250102,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world”, “nation” and “society”, the authors interpreted the complicated history of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sports, and by collating and studying abundant historical data, the author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world” contains our ethical imagination about the world of existence experience, which shaped and affected the inception and occurrence of new national spor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a great extent, containing such a particular political imagination as making China powerful and its people rich, contained in modern Chinese sports; “nation” represents the awaken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s in crises and dilemmas, which gives a tint of “nationalization” to the rising and developing of sports, and is fully embodied via the ideology and practice of militarized national sports; “society” means the awakening of people’s self consciousness and the transfer of sports to the folk, the lightening of political colors and the focus on daily life become the themes of sports development in this period, declaring the return of values sports should have as sports.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 new national sports; militarized national sports; sports nationalization; sports socialization

审视一百多年近代中国体育的生成和发展, 无论是“天下”观念的近代转变与新国民体育的塑造, 还是现代“国家”意识的出现与体育国家化的生成, 抑或是“社会”思想的形成与社会化体育的起步, 体育作为个体和国家共同发展的重要方式, 从来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象: “天下”代表的是一种朴素的传统政治观念, 是近代体育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 “国

家”蕴含基于个人权利的近代政治观念, 是近代体育政治诉求的集中体现; “社会”则表明一种自我得以更加积极实现的人本诉求, 这是近代体育发展之于政治的重要意义所在——这种历史变迁真实地契合了中国社会的近现代进程, 也是我们恢复近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真实历史面貌的思想主线, 由此近代中国体育所承载的政治价值和历史意义才能实现自身逻辑与现

收稿日期: 2015-10-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TY03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12YJCZH025)。

作者简介: 程卫波(1978-), 男,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体育人文社会学。E-mail: weiboch@aliyun.com.cn 通讯作者: 张志勇教授

实的真正统一。

1 “天下”观念与新国民体育的塑造

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古已有之,“天下”承载了中国人最为基本的世界观,其中包含固有的知识体系、价值规范和实践场域,诸如权力神圣、道德绝对、秩序天然等,渗透在高高在上的政治和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政治文化大都由此而衍生。然而,按照西方科学认识论的观点,天下并不具有事实经验性的科学支持,而仅仅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先民对自身生存体验的想象,展现的是中国人对自身特有生存境遇的感受和理解。由此可见,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天下”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不同的,并不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清晰的主权边界,也不能用来指称整个世界,而是一个具有极强伦理意味的整体性观念。在此秩序中,特别关注人的主观世界的塑造,即个人的德行,希图通过个人精神品质的塑造,达成整个社会安定,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图式^[1]。

这种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上的天下国家观,在清末随着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运动的失败而逐渐发生转变,取而代之的是新国民的观点不断被人们认知。以近代中国体育的生成和国民观念的初现而言,真正关键的转折期并不是出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一般都认为是近代中国体育史开端的历史事件,其实体育对人们的影响只是隔鞋搔痒。从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派遣的120名留学美国的幼童所受的指责,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体育进入中国遭遇到的非难,这个新鲜而充满活力的事物,遭遇儒家礼治传统,必然会步履维艰^[2]。因此,近代中国体育关键的转折期,实际出现在为期不长的中日甲午战争,使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彻底颠覆。此时出现这样一种论调,即坚持体育必须与国体同步改革,这种为民族的兴亡与国体打造而进行的近代中国体育运动,在戊戌维新运动后开始走上历史前台。

近代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将提升国民身体素质与国家的兴衰强弱联系在一起,自然就把拯救民族危亡和实现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发展体育教育、振兴体育事业上。这种对体育教育的重视,首先体现在将学校体育教学课程的设置放到民族和国家的政治高度考量。1895年1月,严复发表《原强》一文中首倡力、智、德三育,称力、智、德三育为国家民族富强的基础,而民之手足体力尤为重要^[3]。进而大声疾呼:“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他认为学校体育是“鼓民力”的重要方法之一,“故庠序校塾,不忘武事,壶勺之仪,射御之教,凡所以练民筋骸,

鼓民血气者也。”^[4]1896年,谭嗣同^[5]提出“主动”的教育思想:“西人以喜动而霸五大洲,驯至文士亦尚体操,妇女亦侈游历,此其崛起为何如矣。西人之喜动,其坚忍不挠,以救世为心之耶教使然也。”1898年康有为在《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学校折》也认为,中国连遭西人入侵,关键在于武备不修,“试问列国之武备何如乎?自普国以小胜法,自是各国效之,举国民皆为兵,其兵皆入校,炮兵、马兵、步兵、工匠、辎重各习其科,皆有文学、算数、地图、兵法之学,不止步伐营阵之法,跳涧逾垒之粗也。”^[6]然而,要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仅仅具有强健的体魄还是不够的,更需要有积极向上的振奋精神。因此,这对当时的体育提出更高的要求,体育不仅仅关乎身体,更在于精神的振奋和意志的提升。1903年梁启超主笔《新民说·论尚武》:“体魄者,与精神有密切之关系者也。有健康强壮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当然这种对身体训练精神主旨的提升,也是来源于对当时西方国家体育发展的认知,比如德国威廉二世视学于柏林小学,其教训曰:“凡我德国臣民,皆当留意体育,苟体育不讲,则男子不能担负兵役,女子不能孕产魁梧雄伟之婴儿,人种不强,国将何赖?故欧洲诸国,靡不汲汲从事于体育。体操而外,凡击剑、驰马、习射、击枪、游泳、竞渡诸戏,无不加意奖励,务使举国之人,皆具国民之资格。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吾国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备以坐废也。”^[7]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内力推动和外力挤压的双重作用下,中国近代体育事业脱离朦胧的天下观念,开始获得民族国家的政治青睐,自此开始体育具有更高政治韵味和精神追求,成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寄托和重要推动力之一。

近代以降,当西方列强以武力一再击溃泱泱大国的虚骄时,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被逐渐打破,改造国民身体似乎成为挽救危机的先决性前提,由此体育这个将新国民身体的打造作为无限上纲的开发形式,显然是深受时局影响的结果。同治时期自强运动讲求武事数十年,依旧败于昔日学生日本的沉痛教训,迫使他们的思维方式从宏观上层建筑改良方面转向理想国民的塑造。“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以及“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正是这一逻辑的必然产物。这种试图在“健身、养心”的传统体育场域中生硬开辟出民族生存的基础领域,是近代中国体育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清帝国传统国家体系日趋衰败无力时,赋加在近代中国体育的民族考量正以有增无减的形势塑造着国民的身体。这种现实的需要却也隐含了一个内在危险,那就是体育的发展以及对身体塑

造的无限可能性,必须置于民族存亡的前提下来权衡,这就使得体育之于身体的价值只能以强调政治的形式呈现在历史的脉动中。

2 现代“国家”意识与体育国家化的生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强大敌人,中国人再也无法保持那种由历史与文化带来的优越感与傲慢,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古以来对世界的认识,“国家”取代“天下”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这种情势下,国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成为近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参照系。1903年清朝政府颁布实施“癸卯学制”,仿照日本建立新教育制度的同时,也全盘吸收日本体育教育,在学校中开设体操课,实施普通体操与兵式体操。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将“体操”正式纳入学校教育体系,从高等小学堂的“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一直到高等学堂的体育教学内容“宜以兵式体操为主”,“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泳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而尤时时以守秩序、养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8]。1906年3月,荣庆在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又明确提出“尚武”一项,所谓尚武,即全国皆兵,“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律儿童熟见而习闻之”^[9]。一时间,尚武之风盛行于学校,一度成为尚武救国的教化场所^[10]。

尚武之风在体育教育中的兴盛,将身体改造与国家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由蔡锷在《新民丛报》署名发动的国民改造运动,不但开启一场为时将近20年的身体改造运动,同时也将“国家”这个概念塑造成体育忠诚的惟一对象。这个以国魂为召唤,以体育的军事化开发作为诉求的主张,毫不遮掩地呼吁近代中国体育应该将身体视为国富种存的根本基础。之后,这个经由蒋百里、张骞、蔡元培等重要知识分子呼吁的体育国家化思潮,不但使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主张获得一个更加具体的方向,同时也使得“尚武”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号召力的符号^[11]。1912年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12]对于民国教育曾开宗明义地直陈:“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虽然在蔡元培的理想教育中,一个完善的学校教育至少还应包括实利、德育、世界观和美育等教育形式,但在国家层面上,军国民教育还是最受各界重视的教育形式。因为不论就主从、缓急、先后和轻重的区分来说,它都最符合中国当时的需求。无须讳言,道德问题需要长时间的无形教养,无法一蹴而就,实业问题也可以通过集股临时筹建,惟有武力不可以假借。而

在内江外侮,国忧于眉睫的情况下,将学校体育设计成磨炼身体与训练心智的场域,甚至养成服从于纪律的身体,便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体育教育目标。

辛亥革命胜利后,将国家前途与富强建立在德日等国军国民思想的成功经验上,虽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却也造成体育自此成为国家权力的从属物。如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决议要求教育部以军事动作、知识和军用规则管理和教育中小學生,贾丰臻^[13]呼吁学校寄宿生活当采军营制,以严格的时间和空间管制纪律化学生的生活于身体,以淘汰的方式来殆除体格孱弱、不堪造就的学生的做法等,都说明军国民思潮在此时的强势。在这种情况下,战斗力与爱国心的培养便成为中小学的主要工作。由此可见,在亡国压力的环境下,以及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被迫实现现代化时,这种直接施加于体育试图改造国家前途的军国民体育思想,使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体育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单向度发展趋向。

除这些客观危机的触发外,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发展根源在于体育适应当时中华民族政治发展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民族主义政治思潮。军国民体育思想在古斯巴达、德意志、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民族均有体现,并成特定历史时期民族振兴、国家崛起的精神动力。对于近代中国而言,睁眼看世界以后欣然接受这种军国民体育思想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军国民体育思想强调以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为动力,这切合近代中国各个阶层尽快摆脱落后局面实现民族振兴的心理需求,成为当时中国应对困难时局的一种救世方略。在这种情况下,体育作为规训民众身体的重要方式自然也就具有了浓重的工具化色彩,承载着民族拯救与国家自强的寄托和希望。由此,军国民体育思想就成为20世纪初主导中国体育发展的最强音。由知识分子推动、引介并被国家最终采纳的军国民体育,通过各种规训力量的纵横交错,最终使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条件——体育的国家化,并在亡国的氛围中开展起来。

3 “社会”思想与体育社会化的起步

“社会”代表不同于国家的自主市民生活,是现代公民生活去政治化的重要表现。作为西方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社会”思想伴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而对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由之引起了中国体育的社会化发展进程。在新文化运动——国家崇拜话语倒塌以前,“社会”没有被作为独立空间加以认知,而在此之后,对“社会”而不是对“国家”的理解成为历史研究主题,或者说,对“国家”理解也必须在认识“社会”的前提下才能重新获得意义^[14]。这种思想观念重

要的转向,体现在体育上就是随着军事强人权威主义走向帝制运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会议的凌辱,军国民体育开始丧失它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许多国内人士逐渐认识到军国民教育是德、日等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必须加以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一改过往对于军国民体育的追求,以“养成健全人格”作为体育新的发展趋向。这个体育思想骤然的变化虽然欠缺深思熟虑,却也造成近代中国体育自此脱离“国家化”的单向度,开始步入多元发展的阶段。

对于中国而言,体育的社会意义更多源自对西方自然主义体育的引进和重视。自然主义体育提倡人性的解放,主张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自然发展规律,强调人的自然本性和价值。自然主义体育在近代中国学校体育中的出现,丰富体育教育的内容和教学形式,愉快活泼的课堂气氛也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参与体育运动、学习和掌握体育知识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充分燃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也为我国现代体育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中国,军国民体育思想渐渐失去主导地位,僵化且束缚身心的兵式体操渐渐废止,学校体育内容开始多样化,全民体育也被提倡。即使之前曾令国人引以为豪的“国粹”武术,也开始改变单一武术救国之理念,更多从强健体魄的角度阐释武术的特殊作用。这种自然主义体育思想首先影响我国国民对中国传统拳术的重新认知。在中国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拳术,使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慢慢深入社会民众心中,整个社会对于体育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获得提升,由此体育运动不再仅仅是一种强国振兴的工具,而是与普通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1920年1月份版印的中文报纸《申报》中涉及体育的消息有60则,而占比重最大的是关于各类单项比赛以及综合性运动会的介绍,共39则,占全部信息的65%。另外,体育的社会化问题获得政府的支持和制度化认可。在1927年蒋介石建立国民党南京政府之后,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体育法令,同时也对学校的各项体育措施做严密的规定,试图把北洋军阀时代松散的体育教学制度化^[15]。除加强学校体育之外,还重视全民体育的发展,一方面颁布《国民体育法》,另一方面通令各县市至少设置一座公共体育场,力图使体育深入民间^[16]。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把原由私人团体筹办的全国运动会,转为政府单位承办,还兴建大型体育场,1931年就在南京中山陵附近修建当时全国最大最完善的“中央运动场”^[17],以配合全运会的召开和满足部分人体育锻炼的需求。因此,在此阶段,体育相比以往获得了短暂的辉煌。

然而,随着南京政府“训政纲领”和“训政时期

约法”的接连颁布,初现本真体育的努力,还是无法对抗有国家作为背景的训政时期体育。众所周知,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他在《新生活运动发凡》的讲话中说到:“新生活运动最后之目的,在求全国国民之彻底军事化,而军事化之精义,即在共同一致四字。故新生活者,不过为生活之外表的形式,而军事化者,乃为其实质的内容与最后之目的。”^[18]新生活运动注重人们“纪律”、“习惯”的养成,目的是为要培养具有军事化思想、任何时候都能行动一致的国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新生活运动正好契合体育在培养国民“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方面特有的功效。

除源自国家统一而来的训政时期的体育外,苏区根据地兴起的新民主主义体育,也是必须加以留意的体育形式。新民主主义体育的重要特点就是突破军事训练局限而重视体育的群众基础,将群众体育的发展与群众的精神改造结合,作为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1933年成立根据地最早的群众体育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提出“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发展赤色体育运动,养成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与强健体格,适合阶级斗争的需要”^[19]具体工作方针,在苏区根据地体育工作具体方针的指导下,体育活动从部队到地方都开展得很活跃。为“培养共产主义建设的新后代”,苏维埃政府也非常重视学校体育,如在1934年《小学管理大纲》和193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中,为保证学校体育的正常开展,对学校运动场地和设施提出专门要求——“学校的运动场,至少有一平坦的草坪,尽可能设置一些体育用具和建筑,例如秋千架、杠子、跳远的沙地等。”还有为加快培养地方和军队干部,苏区根据地还创办一批大专学校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和师范学校等。这些院校有的安排了体操课,有的把体育列入常识科目,有的结合军事训练进行体育锻炼。更为重要的是当时采取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体育竞赛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当时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也适应了当时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力量的重要载体。当时,尽管战事频繁,各种物质条件十分艰苦,苏区和各根据地依然十分重视通过竞赛普及体育的做法,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体育竞赛运动。如1931年5月1~4日,鄂豫皖根据地召开大型运动会;1933年5月30日~6月3日,在瑞金叶坪大练兵场举行“五卅”全苏区运动大会。这些运动会的项目除现代田径、球类项目外,还有投手榴弹、越障碍、刺枪、劈刀等军事项目和武术。由此可见,这个按照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体制而施行的体育方

式, 同样也凸显体育在近代中国一直是以多种多元、普遍和恒常的形式生成发展。在追求国强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大前提下, 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在其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破碎与不连续性, 而这正是国家社会借体育完成某些功用所经历的开发过程。

这些事件向我们传递这样的信息: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体育渐渐褪去军事和尚武的神圣光环,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开始向社会融入。然而, 自然体育与军国民体育一样都具有明确的国家目标和民族目的。围绕着这样的指向, 这两种形式的体育都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高度的关切和深入的思考。在五四运动中, 知识分子们对于儒家文化压制人性的方面进行激烈的批判, 并由此联想到国民性的改造与国家抵抗力衰退的问题, 提出将强健身体与理智精神加以有机关联的思考与期许。就自然体育思想而言, 尽管在形式上对军国民思想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与批判, 但在内在价值诉求方面, 除了具有追求个性和身体解放的精神旨趣外, 其实对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渴求并不比军国民体育有任何松缓之处。在这一点上, 军国民体育和自然主义体育有着一些不可见的交集存在。尽管在个人还是国家哪个在前这个问题上, 二者有明显的区别, 但是在面对国家危亡与民族兴衰的大局上, 双方又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因此, 可以说, 自然主义体育同样也具有一个浓厚的国家规训与工具化的趋向。

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是“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 西方意义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在中国可谓先天发育不足、后天成长迟缓, 民间社会力量的相对匮乏使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过多地受制于国家政治力量, 负载了太多的政治期待, 这对于体育的独立发展相当不利。因此, 无论是新文化运动后的自然主义体育, 还是南京政府训政时期的体育, 抑或是苏维埃政权的体育, 在这些力量的纵横交错下, 社会体育较之以前尽管有所发展, 但赋加在近代中国体育之上的规训性力量一直未停止过对身体的征服。换言之, 在此阶段以个体健康为本位的社会体育表面上开始起步发展, 但体育的国家化和工具化趋向一直是近代中国体育难以回避的历史情势。当然, 我们也不能由此完全否定民间社会力量在强大国家诉求下的艰难发展, 毕竟这为中国社会的真正健康成熟和完善发展带来希望, 也为中国体育在强大政治诉求面前以符合体育本身发展规律的方式追求和实现自我本真发展提供契机和可能。

参考文献:

- [1] 吴杰. 传统“天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对接——对《清帝逊位诏书》宪法意义的反思[J].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14(1): 126.
- [2] 郎净. 近代体育在上海(1840—1937)[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84.
- [3] 张贤松. 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影响[J]. 体育学刊, 2002, 9(6): 18-20.
- [4] 严复. 原强[G]//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 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8: 358.
- [5] 谭嗣同. 谭嗣同全集(仁学·十九)[M]. 上海: 中华书局, 1981: 321.
- [6] 韩小林. 戊戌变法与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J]. 齐鲁学刊, 2004(1): 101-103.
- [7] 梁启超. 新民说——论尚武[N]. 新民丛报, 1902: 29-30.
- [8] 学部奏请宣誓教育宗旨折[J]. 东方杂志, 1906(5): 85-86.
- [9] 舒健. 晚清军事变革的历史思考[N]. 中国青年报, 2011-04-08(09).
- [10] 胡科, 黄玉珍, 虞重干. 近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演变中的身体线索[J]. 体育学刊, 2010, 17(9): 8-12.
- [11] 黄金麟. 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46.
- [12] 蔡元培. 新教育意见[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0: 4083.
- [13] 贾丰臻. 实行军国民教育之方法[J]. 教育杂志, 1915, 7(7): 138-145.
- [14] 杨念群. “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02-203.
- [15] 苏竞存. 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158-164.
- [16] 吴文忠. 中国近百年体育史[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7: 209.
- [17] 唐永干, 王正伦. 国民政府时期体育的社会化及其启示[J]. 体育学刊, 2004, 11(3): 32-35.
- [18]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A]. 南京: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 72.
- [19] 党挺. 中国红色体育的演进与发展[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 39(9): 29.